

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重庆市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CHONGQINGSHI SHAOSHU MINZU YINSHI WENHUA /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十一五」民族文化重点项目

丛书主编
本册主编

杨如安
袁昌曲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丛书

重庆市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CHONGQINGSHI SHAOUSHU MINZU YINSHI WENHUA /

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十二五』民族文化重点项目

丛书主编 杨如安
本册主编 袁昌曲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庆市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 袁昌曲主编. — 重庆 :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621-7384-7

I. ①重… II. ①袁… III. ①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介绍—重庆市 IV. ①TS9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1563号

重庆市少数民族饮食文化

袁昌曲 主编

责任编辑: 张渝佳 曾 文

封面插画: 刘 洪

装帧设计:  周 娟 廖明媛

排 版: 涂 敏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scbs.com>

地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市场营销部: 023-68868624

邮编: 400715

印 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30mm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36千

版 次: 2015年11月 第1版

印 次: 2015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7384-7

定 价: 83.00元





《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 任：唐步新

执行主任：向远道 张诗亚 高 峰 杨如安

副 主 任：王云生 周晓波 喻柏炎 付茶生 顾 勇

成 员：孔 刚 任 华 吴 涛 杨胜华 何松涛

谭 伟 刘 涵 田 阡 肖泽平 代 银

陈 彤 唐洪祥 程培才 袁昌曲 康 康

范才成 刘春卉 黄 涛 张持平 郭 君



渝东南是重庆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在这片 1.98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土家族、苗族、侗族、彝族、蒙古族等多个少数民族。这里是武陵山区的一部分，山势陡峭，峡谷幽深，溪流众多；这里是我国东西民族文化走廊和南北民族文化走廊的交汇处，文化悠久，史载丰富，民风淳朴；这里是鄂、渝、湘、黔四省（市）的交汇处，各个民族相互交融，相互学习，难分彼此。

一、渝东南奇特的自然环境及其经济发展

渝东南地区地处重庆市的东南部，包含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黔江区、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以及武隆县，面积为 1.98 万平方千米。其主要地形为山地，喀斯特地貌遍布全境。

境内山势陡峭。武陵山覆盖全境，有大小山脉一百多座，如武隆仙女山，彭水摩围山、独勇寨山、壶头山、盈川山、伏牛山，黔江八面山、酉阳山、灰千梁子，酉阳巴惯山、百岁山、翠屏山、玉柱峰、钟灵山，秀山大峰门山、寿山、黄牛山，石柱的石柱山等。此地区关隘林立，如黔江石胜关、白崖关、老鹰关、梅子关，酉阳凉风关、威武关、北平关，石柱石潼关、砭蒲关，彭水天池关、亭子关，常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很多时候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曾有“环酉皆山，绕以溪流。旧传有九溪十八洞”的记载。

境内高山林立，峡谷幽深。黔江有官渡峡、神龟峡，连现在的黔江新城与旧城之间也是一个大峡谷相连接，因此有“峡江峡谷之城”的说法。彭水有神龙谷，峡谷四周林木葱茏，峡内翠竹环绕，灌木丛生，植被茂盛，溪流淙淙，飞瀑高挂，溶洞密布。酉阳有笋岩大峡谷，峡谷两岸群峰俊秀，峡谷最宽处 10 米左右，窄的地方仅有两米多。

境内溪流众多，其中有两条河对渝东南的发展至关重要，成为渝东南人民的母亲河，这就是乌江和酉水。乌江发源于贵州，从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进入重庆酉阳。自流入渝东南以后，经过了酉阳、秀山、黔江、彭水、武隆等区县，沿途有甘龙河、小河、阿蓬江、洪渡河、诸佛江、阿依河、郁江、芙蓉江、清水溪、大溪河、麻溪河等众多支流汇入，成为古代渝东南最重要的水上交通运输线。发源于湖北宣恩县的酉水经过酉阳、秀山，流入湖南省沅陵县，汇入沅江，在渝东南流经200多千米，有梅江、平江、岑龙河、马路河、麻旺河、大江溪等溪流汇入，成为古代酉阳、秀山两县的主要水上交通线。

正是渝东南的自然环境，造就了渝东南人民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农业方面，渝东南地区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玉米与荞麦成为主要的粮食作物。如彭水“境内山多田少，近水平陆处颇可种植粳稻，其高山深谷多种御麦及荞稞为食。农民勤苦终岁，仅足自给。间有充裕之家，亦不过积谷数百斛而已。遇荒歉，辄以赈贷乡邻，无闭余以厚自封殖者”。^[1]黔江、彭水、秀山、石柱只有部分地区适合种植水稻。黔江在清代“民食稻米而外，包谷为大宗，兼以酿酒，贫富利赖山野，居民多种蕃薯、洋芋，或掘蕨粉，以备食用之不足”。^[2]在矿石开采方面，秀山主要有锑矿、锰矿等。清代以后，“锑则湖南益阳、邵阳、新化、沅陵、慈利、湘乡、祁阳、新安、溆浦，贵州铜仁，四川秀山……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土法，或用西法”。^[3]在工商业方面，彭水郁山镇的盐业及其产业链影响甚大。除此以外，茶叶、桐油、生漆、山货也是主要的贸易产品。秀山“擅桐油之利，以故江右楚南贸易者麇至，往以桐油，返以棉花，年来更为辐辏”。^[4]清朝道光年间以后，养蚕及缫丝也成了彭水、黔江的一项主要产业。黔江“道光初年以来，城乡多植桑树，每至养蚕之候，男女采桑不倦。茧成，取生丝自织出售，较卖丝者其利差厚”。^[5]彭水“邑内旧无蚕桑，妇女惟勤纺织。近年境内多养蚕缫丝者，茅田、细沙等乡，纺棉织布，机声相闻，妇女皆有恒

[1] [清]庄定域修，支承祐等纂，《彭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三《风俗志》。

[2] [清]张九章修，陈藩垣、陶祖谦等纂，《黔江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总五卷首一卷，卷五《风俗志》。

[3]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百二十四《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

[4]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5] [清]张绍龄纂修，《黔江县志》，咸丰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一《山川志》。

业焉”。^[1]以至于到了清代光绪年间,渝东南地区出现了较为繁华的景象:“城内书贾坊肆,亦较前为多。邑当商贾未通时,民间衣止布素,食止鸡豚。近因各省通商,锦绣纨绔及山海珍错,市肆中皆可购买。”^[2]

二、渝东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及其社会价值

由于渝东南地区奇特的自然环境,境内崇山绵亘,河流迂回,交通极其不便,出现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内”的现象,几乎与外界隔绝,成为名副其实的“桃花源”。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与外界很少交往,也就保存了许多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许多的民族文化随着历史的沉淀、区域的融合不断积聚起来。这些民族文化内容极为广泛,既涉及民风、民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包括军体文化、教育传统、家族家规等内容。

(一) 淳朴的民风

渝东南整个区域由于与外界交往较少,受外界影响较小,许多人一辈子很难走出大山,“日出而作,日落而栖”,养成了淳朴的民风,许多典籍都有记载。如石柱“土民俭朴,无骄侈奢侈之习,改流以来,生齿日繁,若俭而济之以礼,朴而辅之以文,庶彬彬是风,同归大雅”。^[3]黔江“民性较厚,狱讼渐稀,囹圄每至空虚。长民者果能帅之以正,从善甚易”。^[4]彭水县“民风淳朴,素无盗贼,乡村收获,咸露积拢亩,往来过客,不携行粮,投宿寻饭,无闭户者,其风气甚古”。^[5]酉阳“然自改土来,沐浴四十年之教,农安稼穡,士习诗书,风气断断乎一变”。^[6]这些史料都充分说明了渝东南地区在历史上形成了良好的民风。这些良好的民风直至今天,对渝东南人民还有着很大的影响。

[1] [清]庄定域修,支承祐等纂,《彭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三《风俗志》。

[2] [清]庄定域修,支承祐等纂,《彭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三《风俗志》。

[3] [清]《嘉庆重修一统志》,《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酉阳直隶州》,卷四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清]张九章修,陈藩垣、陶祖谦等纂,《黔江县志》,光绪二十年刻本,总五卷首一卷,卷五《风俗志》。

[5]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6]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二）简朴的婚俗

渝东南地区的婚俗非常简朴，没有大肆铺张的传统，也没有买卖婚姻的现象，都是按照地方的约定俗成。如黔江“止凭媒证，不取聘财，如许聘，先临女家，以插香为定，男家乃备礼物服饰，父兄与媒妁率子弟至女家叩谢，名曰谢允。男女十六七岁方完婚，无男大女大之风”。^[1]酉阳“凡两家结婚，先以媒妁之言，既允，即嘱媒妁持果盒、香、烛、布、帛、鸡、酒等物至女家为聘，谓之插香；女家寻将女之生年日月书红笺上，仍嘱媒妁持赴男家，谓之发庚；将娶前期三日，女家置酒邀婿会亲友，谓之过门。至期，男家鼓乐迎女至家，行合卺礼。三日庙见”。^[2]秀山“择门户之相当者，媒妁既有成说，然后具礼为聘。成婚之日，婿不亲迎，惟以鼓吹肩舆迎女至家。上堂交拜毕，入室行合卺之礼，妆奁称家贫富”。^[3]彭水县“男女婚聘，以媒妁拜允为重，行聘以簪服烛酒，无聘金彩币，嗣有请庚、报期、亲迎，尚存古礼”。^[4]这种简朴的婚俗，既体现了渝东南人民的淳朴，也表明了对婚姻和爱情的真诚。

（三）薄葬的丧俗

虽然渝东南大部分地区仍然实行土葬，但其民风提倡“厚养薄葬”，强调对家中老人的孝道，注重人生的养育。黔江“丧礼：小殓、大殓胥遵古制，殓后多演行文公家礼。一二日择吉便葬，从无久停柩者。地用佳壤，亦不苛择牛眠。祭礼：宗祠颇少，每遇佳节，庆祝而已。惟七月中元，士民概备信袱接亡，设供中庭荐新。若清明扫墓，与他处同”。^[5]酉阳“初卒，焚纸锭，设灵，棺殓。每七日必招僧道讽经，为之念七。将葬，讣告亲友，先期设祭，谓之开奠。至期，朝暮奠哭无时，亲友亦持楮币或酒盒猪羊致祭。既葬，虞祭、除灵，或三年后始除”。^[6]秀山“大小殓毕，男女始擗踊举哀，置灵座，焚楮币，停柩于堂，择吉设奠，讣告亲友。至期，有朝暮奠题主等礼，亲友亦以牲牢酒醴致奠。出殡之

[1]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2]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3]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4]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5] [清]张绍龄纂修，《黔江县志》，咸丰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二《风俗志》。

[6]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日，择有德望者代祭舆神河伯，所送明器陈于殡前。既葬，反哭，奉主置灵座内，朝夕奉祀，惟谨三年，礼始毕”。^[1]彭水“丧事无停柩于室者，成服后即营葬。事将发，引鸣锣以招其亲邻族姓，曰伴夜送殡。返，供灵座于室，或一年或三年，虔修佛事，以除灵，丧事始毕”。^[2]这种厚养薄葬的习俗，现在在渝东南地区还有很大的影响力。

（四）艰苦的生活

渝东南的生产方式主要是根据其地形、地势和气候特点而进行种植、养殖。如石柱“民以食为天。土人惟食稻，且惟知艺水稻。厅地山多少平原，凡围者曰田，不围者乃曰地。山腰山脚绝无水泉可引，亦概围之曰田。春雨满其围，蚩氓欣喜插秧。入复五日不雨，则秧槁，乃呼吁祈祷。十岁经七八，劝之去围，以艺他谷或旱稻，不信也。故谋麦梁菽皆仅见，山地最多者包谷，以其根大易长，人食有余，即可酿酒饲豚，岁计收成分数，包谷为水稻之辅也。农不知粪圃，亦不知粪，故园蔬瘦小，蔬不肯恁采，果不待熟鬻。岁歉则掘蕨根为粉食之”。^[3]此外“厅境山多田少，田宜秔稻，山地艺菽麦，亦艺棉花。土至瘠薄，全恃雨泽，不耐十日旱。雨甚大，亦畏之，恐刷去浮土即成石田矣。南境深山，惟玉蜀黍可种，贫民资以为粮，罕食稻米也”。^[4]

饮食以本地出产的水稻、玉米、荞麦等物为主，饮酒主要用本地出产的苞谷（即玉米）酿造，俗称“苞谷酒”。如黔江“民间日食以包谷为重，并用以酿酒。居民多种蕃薯、洋芋，兼取蕨粉以备冬夏食用之不足。每日朝饔夕飧，无燕饮消夜之俗”。^[5]此外石柱的咂酒也颇为有名。“厅人酿酒，制秔米或黍、稷、梁、粟，贮磁瓶中，月余始熟，将燕客以热水注满，截细竹通其窍，如瓶底吸而饮之。浅则添水，至味淡乃止，谓之咂酒”。^[6]

这种因地制宜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很多都流传至今，如食用蕨粉、绿豆粉，生产苦荞酒、苞谷酒、咂酒等。

[1]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2]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3] [清]王槐龄纂修，《补辑石柱厅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总二册十二卷，卷六《风俗志》。

[4] [清]王槐龄纂修，《补辑石柱厅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总二册十二卷，卷六《风俗志》。

[5]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6] [清]王槐龄纂修，《补辑石柱厅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总二册十二卷，卷六《风俗志》。

（五）艰难的劳作

渝东南艰苦的自然环境使得老百姓劳动强度加大，劳动时间加长，劳动区域拓宽，劳动收成却减少。老百姓既要考虑天时，又要考虑地利，还要预防野猪等的侵害。这种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使得老百姓特别注重农时，按照农历的24个节气安排农事生产，尤其是立春、春分、夏至、冬至等节令备受重视，要举办相关的仪式。如立春的时候，要举行迎春、说春、打春等活动。其中与农事极为密切的插秧节最具区域特色。每年的农历四月，等秧苗长到五六寸长，乡人集体栽插，“集众数十人，择二人为众信服者分司钲鼓，鸣鼓击钲以督众，曰打闹。（打闹之事行于插秧者，少行于芸苗者，多水田山土、薅茶去蓼之际，所在皆然。司钲鼓者亦不必为众信服之人，但视其能歌与否，彼等所歌，皆育词、小说、七字成语，此歌彼和，嬉笑讹谐，互相酬答，盖不惟用以督众亦所以节劳也。）”^[1]其后还在薅秧的时候，唱起薅秧歌，认为薅秧能够去稗子、除杂草而养嘉禾。薅秧、薅草能够让收成增倍。（“薅秧有一薅、二薅与三薅者，薅之勤，则粟壳薄而米粒坚。故农家作劳，其用力至者，其收自倍也。山土之薅草亦然。”）^[2]

对农事节令的格外重视，一方面体现出渝东南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对农业生产极为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渝东南地区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不能错过时节，否则就可能造成全年无收。艰苦的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勤劳的品质。

（六）敬畏自然的祈祷

渝东南地区自然环境恶劣，“靠天吃饭”使人们格外敬畏自然，再加上科学知识没有普及，人们总相信在冥冥之中有一位看不见的神灵在左右着生活。因此凡是人们身体有疾病、生活有困难、邻里有纠纷、气候有异变等都向神灵祈祷，或举行一些祈福的活动，至今在农村还生活着一些“跳神”的端公、梯玛等。酉阳在清代“凡卧病服药不效，则招

[1] [清]王麟飞等修，冯士瀛、冉崇文等纂，《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同治三年刻本，总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卷十九《风俗志》。

[2] [清]王麟飞等修，冯士瀛、冉崇文等纂，《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同治三年刻本，总二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卷十九《风俗志》。

巫祈禳，亦有愈者”。^[1]黔江“每岁孟夏，或设坛玉皇阁，东楼，南楼，斋醮数日。文武官亦诣坛上香，为民祈福”。^[2]秀山“遇有疾病，颇信巫覡，或白昼吹角跳舞，唢呐不休，俗谓之跳神”。^[3]彭水“民俗信事鬼神，乡里有争角，辄凭神以输服，有疾病，则酬神愿，大击钲鼓，请巫神以咒舞。又云：神之最灵者曰羊愿，设坛于旷野，宰羊以祀，虔奉羊首，以问福祸。又云：井灶之祀神尤灵验，如经年不祀，辄有崩崖、破锅、伤人等，应其奉祀最虔，以一人扮舞咒诵，并非寻常经忏，似有神物凭依之，仅令一人工其事，不至以传习者。”^[4]

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文化的普及，现在通过祈祷解决困难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少，人们更加注重运用法律、医学、科技等手段改变命运或寻求支持，但渝东南地区的农村，敬畏自然的习俗并未改变。

（七）英勇善战的军体文化

渝东南地区，由于自然环境，以及长期处于多省交界处，成为“多不管”地带，导致盗贼横行，匪患猖獗。一些地方势力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就要蓄养一批地方武装。这些地方武装经常训练，强化身体素质。历史上，巴人勇敢，帮助周灭商，賁人帮助汉室平定“三秦”，射“白虎”。“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敛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呼赋为賁，因谓之賁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募賁人平定三秦。既而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5]到了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的建立，更是大大发展了地方武装力量。“土司下的军队，是寓兵于农，全民皆兵，有事打仗，无事种田，把关守隘。练兵很严格，平素练习就是打猎，一人缚虎，二十人助之……以培养勇敢精神……从边境到土司府，设有烽火台，以烽火报警，士兵闻角声则聚……其田任其耕垦，不收租税，战则自带粮食，不给工食。”^[6]石柱的秦良玉以及所带领的“白杆兵”更是家喻户晓、英勇善战的典型代表。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明末，张献忠屠蜀，石柱、酉阳、松潘、建昌等土司据

[1]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2] [清]张绍龄纂修，《黔江县志》，咸丰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二《风俗志》。

[3]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4]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5]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

[6] 鄂西土家族简史编写组，《鄂西土家族简史》，1983。

险御贼，其地独全。”^[1]“崇祯时，土司千乘及妇秦良玉，以功加太子太保，封忠贞侯。子祥麟，亦加封宣慰使。顺治十六年，祥麟子万年归附，仍授宣慰使职。”^[2]“良玉忠州人，秦葵女，字贞素，性颖异，饶胆略，幼通经史，工词翰，且与兄邦屏、弟民屏同习骑射，究心韬略。长归千乘，仪度娴雅，而性行严明。农隙与千乘训练士兵，精劲冠诸部，兵器用长矛，后带钩环，登山涉水，前后相连，皆白木为之，不装饰，厥后屡立战功，石柱白杆兵遂著名海内。”^[3]

（八）勤奋好学的教育传统

尽管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当地人较为贫穷，但渝东南地区的人们尊师重道有较为久远的传统。在渝东南的少数民族家庭，至今中堂都供奉有“天地君亲师”或者“天地国亲师”的牌位；在许多家谱里都有“仁义诗书”的内容；历史上酉阳也出现了冉天育、冉奇鏊为代表的土司文学世家。一些地方志还记载了当地的科举考风良好的事例。彭水“彭邑士人，尊师响学，虽僻壤山民，不求科第，亦多勤肄诗书者。此风在康熙前已然。近年则学校尤盛，城乡各处，弦诵相闻。届小试之年，应试者云集，考棚不能容，较前殆增数倍，且向少滥保、冒籍、鎗替诸弊，士风颇为纯朴”。^[4]秀山“都人士天资明敏，勤咕哔，能文章，每岁生童与州合考数半于州，而岁科所入过之，惜学校未立，见闻固陋，科目亦复寥寥耳”。^[5]这些都说明了渝东南有较好的教育传统和良好的考试风气。

（九）以教化为主的家谱族规文化

在对渝东南地区的考察中，我们在许多地方发现了族谱，在族谱的开篇之章中都讲了族规，对宗族的后辈提出了要求。酉阳后溪镇的白家祠堂门口的石碑上面镌刻着对宗族的要求，临近酉阳大溪镇的湖南龙山县桂塘镇二厅堂的门口立着“忠勇”牌坊，这些都对个人，对宗教及当

[1]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土司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五百十三《土司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

[3] [清]王槐龄纂修，《补辑石柱厅志》，道光二十三年刻本，总二册十二卷，卷七《土司志》。

[4] [清]庄定域修，支承祐等纂，《彭水县志》，光绪元年刻本，总四卷首一卷，卷三《风俗志》。

[5]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地的民族文化遗产有着重大的影响。如酉阳的《冉氏家谱》，介绍了“酉阳冉氏，世袭土司，自宋建炎三年始，时叛苗流劫思南、涪、渝等地，守忠率诸洞獠夷助剿有功，册为宣慰司，是为迁酉之始祖”。在《冉氏家谱·家规》中提出了十三项要求。“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友于兄弟，新睦家族，和睦邻里，敦肃闺门，禁止争讼，勤习正业，定正名分，致谨坟墓，慎选婚姻，教约子弟，慎重继嗣”，这十三项包括如何处理与长辈、平辈、下辈、后辈、家族、邻里、社会的关系，也包括如何进行家庭的管理，确保家庭的和睦，宗族的和谐、稳定。族谱的内容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用前辈、大家之言及谚语来进行说明。如“孝顺父母”就指出：“孝顺，德也。孔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谚曰：‘孝父母，不如顺父母。’顺之一字，最是教之本原。养老固顺，几谏亦无非顺也。我族中子弟，当体念此意，随分竭力，将顺无违。”对“教约子女”则指出：“父兄之教不先，则子弟之率不谨。常见高明之家，衣冠赫奕，诗礼相传，后或溺爱子孙，纵容不教，渐至佚乐宴游，习惯成性，交引燕朋狎友，从事于酒色声歌，数年之后，家产荡尽，流落飘零者，不可胜计。即此可见，教子弟之不可不谨也。顾教之法，无过于读书，贫乏富贵，俱当留意。盖子弟贤，读书即贤达之资；子弟愚鲁，能多读书，多识字，亦必化其桀骜，开其颖悟。”^[1]

（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在渝东南地区考察的过程中，我们时常醉心于渝东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如文学方面的代表酉阳的冉氏土司文学，民歌方面的代表“啰儿调”“南溪号子”“马喇号子”，戏剧方面的代表“傩戏”“阳戏”“后河戏”，舞蹈方面的代表“摆手舞”“花灯舞”“毛古斯舞”，民间工艺品方面的代表“西兰卡普”“蜡染”“刺绣”，饮食文化方面的代表“苞谷酒”“苦荞酒”“咂酒”。在历史上，唐朝时期的巴渝舞就很有名。

“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賸人敬信巫覡，

[1] [清]冉崇文，《冉氏家谱》，木刻本，现存于酉阳县图书馆。

多往奉之。”^[1]到今天，这些文学艺术成就仍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南溪号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大批项目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兰卡普、花灯舞被列为全国职业院校特色发展项目，摆手舞在城乡遍地开花，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娱乐、健身方式。

此外，在渝东南地区还有干栏式建筑特色的“吊脚楼”，有许多在全国家喻户晓的民歌，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么多的民族文化资源对于渝东南地区各族人民的道德浸润、智慧开拓、娱乐健身、情感美化、勤劳致富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促进民族团结稳定、情感升华、社会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武陵山区相互交融的民族文化

由于自然环境、地理位置、人口数量、战略地位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加上“山同脉，民同俗”，渝东南各族人民在武陵山区有较多的交往。酉阳之龙潭镇，是清代酉阳直隶州州府所在地，水陆交通便利，顺水而下可直达常德、辰州。彭水县因为乌江可直达长江，交通便利，且因为郁山产盐，故与外界交往较多。“县治之西有水程直达涪州，接大河，出入懋迁者较便，生童赴省、赴渝应大小试者，其费较省，而人亦较多。又有县治东溯江而上之曰郁山镇，有盐井，比年以来，井更旺而灶更多，邻省商人行盐其地者，往往遂家焉。”^[2]

此外渝东南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较大，实行郡县制的时间较长，在历史上还出现过“相互管理”，互为行政中心的局面，使渝东南几个县之间的交流增多。彭水早在隋朝的时候就设立了郡治，“隋于郡置彭水县。周置奉州，寻为黔州。贞观四年，于州置都督府”。^[3]黔江“洪武五年十二月省入彭水县。十一年九月置黔江守御千户所”。^[4]酉阳直隶州，“隶川东道。明，酉阳宣慰司，属重庆府。顺治初，仍明制。雍正十二年，改重庆属之黔江、彭水二县置黔彭直隶厅。十三年，又改平茶长官司为秀山县，属厅。乾隆元年，废厅，改为酉阳直隶州，以黔、彭、秀三县

[1]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百二十《李特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清]冯士瀛、冉崇文等编纂，《酉阳直隶州总志》，卷十九《风俗志》，成都：巴蜀书社，2009。

[3]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十四《地理志》，北京：线装书局，2011。

[4]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三《地理志》，北京：线装书局，2011。

来隶”。^[1]1988年，四川省成立黔江地区，以黔江为地区中心所在地，辖酉、秀、黔、彭、石等县，直到2000年。之后重庆设立六个区域性中心城市，黔江成为渝东南的区域性中心城市。

只有石柱与酉、秀、黔、彭相对要独立一些。“石砭宣慰司（元石砭军民宣抚司，明玉珍改安抚司）。洪武八年正月为宣抚司，属重庆卫。嘉靖四十二年改属夔州卫。天启元年升为宣慰司。”^[2]

由于这种交流与交往，出现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如“吊脚楼”这种干栏式建筑就成为土家族、苗族以及居住在此的汉族同胞共同采用的房屋建筑结构；在渝东南少数民族的家中都供奉着的“天地君亲师”或者“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也成为整个渝东南地区尊师重道的共同信仰；汉族地区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也是渝东南各少数民族共同的节日；南溪号子、秀山花灯、后河戏等既有本民族的文化成分，又融入了汉族和其他各个民族的文化成分。

四、丛书简介

“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丛书”共七本。

《重庆市少数民族生命之礼》，记录了渝东南少数民族同胞从出生到去世，一生所经历的礼仪，包括出生之礼、婚恋之礼、寿诞之礼、丧葬之礼、祭祀之礼以及常用礼仪等方面。

《重庆市少数民族民间音乐》，音乐是渝东南各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中抒发感情，战胜自然，乐观生活的真实表现。本书对渝东南少数民族音乐进行搜集、整理，将其分为民间歌曲与戏曲音乐两大部分。民间歌曲按风格、内容及形式分为劳动、叙事、抒情、仪式、教化和童谣六类。戏曲音乐分为秀山花灯和后河戏。

《后河戏剧本集》，收录了从1869年到现在，在黔江濯水、马喇一带演出的后河戏主要剧目，包括最早的《二度梅》《天水关》，后期的《秦香莲》以及原创的《春涌古镇》《分家》等剧本，弥补了1982年因特大洪水把原存的所有剧本冲走所带来的遗憾。

[1]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六十九《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三《地理志》，北京：线装书局，2011。

《重庆市少数民族饮食文化》，介绍了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形成与饮食结构变迁、食材、饮食烹饪技艺与特色宴席、饮食器具、饮食风俗、茶文化、酒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文化遗产研究文集》是2014年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重庆旅游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文化强国战略中民族文化特色传承”研讨会的论文集，收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的37篇论文，分为理论研究、传承路径、传承案例、民族文化与旅游、学校传承五个专题。

《西兰卡普》，介绍了西兰卡普的渊源及形成、生产工具、原材料、工艺流程、技法、色彩及运用、艺术特征与美的内涵、与土家族服饰的关系、功能及运用、传承人，还对西兰卡普的精品进行鉴赏。

《重庆市少数民族碑刻楹联》，此书按照黔江、酉阳、秀山、彭水、武隆、石柱分区县收录了190余件碑刻、200余幅楹联，著录了年代、出处、创作以及相应的故事。碑刻按其用途分为墓碑、路桥指示碑、表旌碑、文人书法碑、宗教民俗碑、政策族训碑、语录碑以及石刻。

这套“重庆市少数民族文化系列丛书”，得到了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各位领导的高度关注与支持，被列为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十二五”民族文化重点项目。这套丛书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课题“文化强国方略中多民族文化教育资源转换研究（13JJD880008）”、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乌江流域民族文化社会价值研究”（14SKB004）、重庆市社会规划一般项目“渝东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五W’传承模式研究（2013YBSH043）”、2014年全国民族教育研究重大课题“以产城教融合推动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实证研究”（mjzxzd1409）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黔江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给予了项目及经费的支持。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杨如安

2015年7月

沿着地球神秘而奇特的北纬 30° 前行,一座巍峨的大山静静地沉睡,它就是绵延 420 千米的武陵山。在大山深处,一条历史悠久、神秘浪漫的“民族走廊”^[1]悄然形成,这条走廊令人沉醉的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在独特的地理环境中所烹飪的美食与美酒。

饮食是古代文化的本原。^[2]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中华民族缔造了博大精深、具有世界性影响、颇具中国特色的饮食文化。^[3]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圈”^[4]里,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空里创造了各具特色的自身饮食文化传统,尤其是少数民族饮食文化更是富有独特的魅力。

具有近代意义的饮食文化研究始于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1911年版)。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由于饮食文化学科定位模糊不清,饮食文化研究相对滞后。其后历经诸多学者不断开拓,饮食文化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有关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研究亦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产生了一大批研究专著和论文。研究成果中,除了傈僳族、纳西族、锡伯族、毛南族、塔吉克族、普米族、鄂温克族、独龙族、保安族 9 个少数民族没有进行专题研究外,其余 46 个少数民族均有不同程度的专题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饮食文化概述性研究、饮食文化特色、饮食文化变迁及影响、饮食文化旅游开发、饮食文化与生态环境、饮食器具、饮食禁忌、饮食文化传承、饮食医药、饮食文化比较、饮食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饮食性别与服饰、饮食词汇和语言、饮食文化与族群边界、各少数民族交叉研究 15 个方面。研究重点集中在单一民族

[1] 黄柏权.费孝通先生与“武陵民族走廊”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7):14.

[2] 高成嵩.华人独特饮食的由来及对文化的影响[J].社会科学论坛,2012(9):4.

[3] 目前学术界对“饮食文化”没有统一的定义标准,各学者根据研究之需对其内涵进行了界定,目前学界公认的是著名饮食文化专家赵荣光教授的观点。参见:赵荣光,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4] 赵荣光教授提出了17—18世纪中国区域大致形成东北、京津等12个饮食文化圈。参见:赵荣光,谢定源.饮食文化概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55~88.